

【城市微旅】

涿口看“悬河”

□程兆强

我家住在济南老城的西北边,离繁华的市区很远,而离城北的黄河挺近。不过,在很多年里,我不敢去看黄河,自从儿时听奶奶讲了黄河发大水的故事后,我对黄河充满了恐惧。

奶奶说,一年的夏天,黄河发了大水,汹涌的洪水(旧年月,我们那里的人把黄河水叫作黄水)冲破堤坝,向岸边的田野、农舍狂奔而来。这时候,整个村庄弥漫着恐怖气息,素日里悠闲自在的鸡,惊慌地飞上了房顶;平时爱趴在大门口打盹的小狗,焦躁地窜来窜去,并且还扯着嗓子汪汪乱叫;村里的村民,更是坐立不安,心慌意乱。虽说人们几天前就听到黄河大堤出现险情,大坝可能不保的传言,可大家抱着“不见黄河不死心”的侥幸,坚守着家园,不亲眼看到洪水进村,不弃家而逃。起初,奶奶不肯走,她舍不得家——虽说家里不富裕,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可那是她和丈夫经年累月、鸟儿衔枝般建起,一家人生活起居、遮风挡雨的地方!可是,看到身边四个大小挨肩的孩子,她胆怯、退缩了,不得不噙着眼泪,和丈夫一起携家带口,随着逃难的人,躲到村东的小山上去了。

洪水退去后,我家的房子虽没被冲倒,可家中财物却遭人洗劫。洪灾给奶奶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多年以后,我从一些星散的资料上,查到了这场水灾的大致情形。资料上记载,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八月,黄河上游连续降雨,暴发了洪水,济南黄河牛角峪段发生决口,滚滚河水冲毁堤岸,肆虐横行,大片村舍和庄稼被淹,连离黄河堤坝稍远一些的张庄、大饮马、匡山等村庄,也不同程度遭到水淹。

去看黄河——把黄河当成风景看,是最近几年的事。这时的黄河,已经不是“三年两次口”的黄河,而是毛泽东所说“我们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”之后的黄河了。

诗仙李白说,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。来自“天上之水”的黄河,流到济南这方土地时,已是高出两岸地面数米、名副其实的“悬河”了。

在济南看黄河,可以说是看“悬河”,而看“悬河”,我常去的地方是涿口。

涿口位于济南的北部,是北出济南的门户,曾经是繁华的码头,亦被称作“上关道口”。这里地势险峻,堤坝巍峨、壮观,是看“悬河”的最佳观景处。

站在大堤下,仰望宏伟的堤坝,你不能不为之震撼惊叹。

上堤的路,有柏油路和石阶路。柏油路,呈之字形,坡度平缓,行人和汽车都能走;石阶路,坡度陡峭,近乎直立,只有年纪轻、胆子大的人愿意走。没登过黄河大堤的人总以为坝顶是黄土漫漫、尘土飞扬,可实际景象是,坝顶上修了平坦的柏油路,路两旁种了许多的杨柳树。这些成排成行的柳树,顺着堤坝向远方不断延伸,翠绿浓浓,枝条婆娑,风一吹,更是袅娜娉婷,秀丽妩媚,让人想起“拂堤杨柳醉春烟”的诗句。在大堤的斜坡上,绿草浓密茂盛,从坝顶一直长到坝底,像铺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绿毯。

堤坝下面便是大片的黄河滩区。现在的滩区已植了成片的柳树,毛白杨,树木郁郁青青,密密实实,成了一道绿色长廊。也许是旧码头的遗留,也许是出于大堤安全防护,这里堤坝上砌了多处石头护坡,隔上一段距离就有一石台阶,游人可顺着台阶下堤走到水边,近距离看匆匆流淌的黄河水。

大堤把黄河和市区分成了两个世界。堤外是高低错落的平房和高楼,堤内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,堤内堤外巨大的高低落差,让你切身感受到“悬河”的惊险。站在大堤上远望,那“天上之水”闪着片片光亮,从遥远的地方奔流而来,裹着泥沙,排着浊浪,浩浩荡荡向东流去。兀然独立的鹤华二山,隔河相望,静默无语,让人想起赵孟頫名作《鹤华烟雨图》中的静美景色。只是当年的鹤华湖,古济水及其各支流,早已干涸消逝,被这滔滔的黄河水取而代之——大自然再次挥动她那神奇妙手,绘就了一幅壮美的山河画卷。

每次看黄河,我都要去看一看那座百年铁桥,像去看望一位百岁的长者,恭顺地、垂立在他面前,听他讲一讲自己的身世,说一说他的所见所闻。每次看黄河,在经过“备防石垛”时,我会停下来,打量打量这些防汛的石料,心中期盼它们永远派不上用场,唯有这样,那黄河才会安然无恙。

说真的,我很少走到黄河水边,更不敢掬一捧黄河水到面前,我看到眼前那“水黄泥沙多”“一碗河水半碗泥”的河水,泪会莫名地涌上来,像诗人艾青看到了大雁河,看到了土地。

涿口大堤已是绿树成林,芳草萋萋,滔滔的黄河与绿色长廊相映成趣。在这里,有远山,有近水,有古老的铁桥,有搭起的浮桥,有走在河滩上观景的游客,有坐在堤边吃着烧烤开怀畅饮的游人,有执渔网在河水里打鱼的人——这里能欣赏到黄河两岸美丽的风景,能感受到气势磅礴的大河风情。这里,已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美风景。

【实录】

大舜『象耕鸟耘』的真实性

□张向阳

前几天,在千佛山下散步,遇到几个小伙子在“舜耕历山”的塑像前留影,塑像的内容是:舜的仁德感动了上苍,于是便有大象为之耕田,百鸟为之耘草,被称之为“象耕鸟耘”。拍完照,几个年轻人一阵风似的爬山去了,边走边说笑:“济南古代哪有大象啊,这些传说太穿越了……”

看着年轻人远去的身影,我有点无奈。按照今天人们的认识,他们说的或许不错,今天的亚洲除了东南亚一带还有把大象用作耕地和运输的畜力以外,其他地方已很难见到。但他们不知道,在历史上,济南还真真是出大象。

据记载,大舜生活在4000多年前的父系氏族时代,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,“舜耕历山,渔雷泽,陶河滨,作什器于寿丘。”在传说中,舜在历山(千佛山)耕种田地时,除了有“象耕鸟耘”这一典故,舜还派他的弟弟象去驯大象。对很多人来说,这似乎只是古人的臆想和传说,然而,根据考古资料和几千年的环境变迁来看,在远古时代的济南,象耕、驯象并非神话,而是事实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泰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过两件象牙梳,其中一把现藏于国家博物馆,此外,大汶口遗址还出土过象牙雕筒、象牙琮等多件象牙制品,反映了5000多年前牙制品的雕制水平。

要说国内最早的象牙雕刻制品,在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就十分突出,尤其在河姆渡文化早期。在河姆渡文化各个遗址中共出土象牙制品30余件,绝大多数出自河姆渡遗址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在河南安



【印记】

旧时济南的畸形行当

□张稚庐

老济南曾有几种五行八作之外的畸形行当,光怪陆离,源远流长。他们为了糊口,不惜自卑,低首下气,藏在民间底层的阴暗角落里自生自灭。如今想起,不禁悲悯。偶拾一二,以窥当年市井生活之一斑。

从前,离吾家不远的汇泉寺,住着个绰号叫陈麻子的“花子头”,从东门里到北城一带的乞丐都归他管。“伸手大将军”及其夫人若要在他的地盘上乞讨,须经他恩准才行。花子们乞取的铜钱及千家饭要供奉他一份。每季他得孝敬“吃吞兕老虎”(当地警察)一部分。他也有“任务”:如每年寒冬腊月倒毙街头的饿殍归他处理。乞丐之间斗殴由他摆平。偶有偷窃的,他要发威惩处。老年残疾花子,他就配一流浪童丐,沿门托钵,俨然祖孙落难。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
平日陈麻子在家坐收渔利,只有每年腊八以后,他才“御驾亲征”:身后带两个二土匪似的乞丐,其中一人挎个柳条篮子。讨要重点是大小商铺、高宅富户。那时,以东门里大街来说,车马辐辏,阗阗繁盛。铺子栉比,多是殷实买卖。每到一处,身后的两个乞丐便声音嘹亮地喊道:“掌柜的,发财呀!”陈麻子则站在前面“徐庶进曹营——一言不发”,只赔笑脸打躬作揖而已。约定俗成,这时节大铺子要打发他二角,小铺子一角。莫小看一角钱,上世纪四十

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三件精美的象牙杯,其中最大的象牙觥杯,通高55厘米,杯身高42厘米,米黄色,系象牙根段制成,是极为罕见的商代象牙酒器珍品。按照现在人的常识,在中原、江浙一带是不产大象的,这些象牙制品的出现,让人不禁疑问,在新石器时代和商代,这些象牙是从何而来的?是产自本地还是从西南方国进贡而来的呢?

除去象牙制品,与大象有关的器具在商周时代也非常多,出土地则是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主。可见当时大象的憨厚可爱、太平吉祥的寓意一直是商周青铜器表现的主题。

罗振玉先生在《殷墟书契前编》中著录一片甲骨上就有“隻象”的记载,“隻”即是“获”的本字,就是古人抓获大象的记载。这就说明当时有野象的存在。罗振玉先生注意到古文字中“为”的写法,他考释为“从手牵象”,“役象以助劳”。罗振玉据此推断:“知古者中原象,至殷世尚盛也。”

胡厚宣先生在《甲骨文与殷商史》中也记录,甲骨文中载有很多猎象的地点,商王曾在处于河南沁阳附近的太行山南侧一次狩猎获取7只野象,证明3100—3200年前这一地区生存着数量较多的野象。

而甲骨文中的“为”字,“从手从象”,即一个人手牵着象在耕种劳作(或表示牵象驯化),这反映了中原地带林草丰茂,气候温暖湿润,用象耕种劳作很普遍,所以日常生活的习惯也反映到了造字中。

除非在动物园中,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经没有了大象。在中国,它们已经“退隐”到云南和东南亚的丛林中。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其著作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一文中精确地指出:“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两千年,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,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℃左右。1月温度

年代前可兑换铜元23枚上下。一个烧饼3枚,一斤猪肉3枚。岁尾的乞讨,他能肥吃肥喝到端午节。中国有句俗话“要饭三年,给个知县不换”说的绝不是饥寒交迫,转乎沟壑者,而是陈麻子之流。

某年,华昌布店的老板外出,由他儿子值柜,少不更事,仅施舍了陈麻子10枚铜元,他称谢而去。一会儿,来了个白发苍苍的老乞丐,还是个瘸子。一屁股坐在店门槛上,叫道:“大少爷呀,你行行好,积积德,给一块钱吧!”少掌柜一听很诧异,骂道:“呸!你疯了,张口一块钱,不怕闪了舌头。”老花子突然咋呼起来:“看热闹的这儿来!”立马围上几个闲人。瘸子慌不忙,从破棉袄里掏出块半头砖来朝自己头上猛砸去,顿时头破血流。旧时忌讳甚多,大腊月里最怕摊上“血光之灾”,少爷大窘,后由保长出面,讹了华昌八毛钱去。显然“热闹”的导演是陈麻子,自嘲“穷出来的见识”。我少时犹见他蹒跚于长街幽巷,侧目而视也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文学家郁达夫寓居杭州时,曾感叹道:“我对于平时杭州人家那一种做寿做喜的铺张耗费,一向是不赞成的,尤其是那一种只重仪式不重实际的恶习。”岂止杭州,济南也如此。且不说缙绅富商,就是普通小康之家每遇红白喜事,无不讲场面、摆阔气,增光露脸,宁奢侈勿竟成风气。大操大办,得有人伺候,以供差遣。于是有了

大约比现在高3℃-5℃。”而根据甲骨文可以发现,商代种稻子比现在早了一个月。

当时中原的气候环境,堪比现在的西双版纳。随着地质变化和气候变迁等原因,大象慢慢退出黄河长江流域。竺可桢先生曾指出,在半坡遗址和殷墟遗址中,可以看到竹鼠、水牛等热带亚热带动物遗迹。而在周初的文书中有些字如篮、筐、算、筹、算、筵等器具,本意都和竹子有关,很多都是竹子制成的器具,可见当时气候温暖湿润,北方的竹林普遍存在。而在史籍中,类似的记录也很多。除了地质、气候变迁,人为猎象也导致大象的减少。大规模的人类活动,使得大象活动范围被压缩。

大象是什么时候南移的呢?有学者分析:进入西周后,亚洲象退出黄河流域,古文献中关于大象的记载出现在扬州、淮夷、楚蛮等地。《三国志》中东吴孙权曾向曹操进贡大象,此时亚洲象应该在江南还有分布。曹冲称象也是大家广为知道的故事。自南北朝至唐朝,四五百年间野象分布区由长江以南继续南移。唐末五代时野象分布北界的东端,已由战国末年的越地,南移至温州、福州、漳州一带。公元920—940年,象牙仍是福建的主要贡品之一。直到南宋,福建漳州一带仍然有大量野象分布,而且数十成群危害庄稼,导致百姓不能安居乐业。在《宋史》中记载“建隆三年,有象至黄陂县……明年十二月,於南阳县获之,献其齿革”等,可见当时湖北等地还有大象活动。有人推测,大约在元明之际,大象退出南岭,直到19世纪30年代,广西十万大山一带的野象才最后灭绝。从此野象退缩于云南一隅。有学者曾经估算,三四千年以来,从华北中原一带一直到云南,大象的领地向南移了两千多公里。

笔者记得,前些年在山东大学校园内就曾挖出过一根古象牙。山东省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些在省内发掘出来的象牙化石,其中也包括一些从章丘、长清等地发掘的,这说明古代济南也是产大象的。所以,“象耕鸟耘”的故事虽然在今天看来很离奇,但恰恰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背景,而不能用虚构、穿越来解释。

“长班”这一特殊行业——专到事主家去做“临时仆人”,济南人俗称“场子上的”。长班不同于一般仆人,他能识几个字,深知“礼数”,各样情形,事事明白,最会察言观色,否则便不克胜任。故干这行业,也要拜师学徒。他们为讨主家欢心,低三下四,老爷、太太、少爷、少奶奶,大小姐,小少爷总不离口。宾客来了,敬茶、奉烟,摆席、上菜、斟酒、打扇、收拾桌椅等都是长班的活。若接了丧事,送讣闻、摆祭桌、上供、烧香、挂挽幛、制哭丧棒、穿孝衣、架孝子、提拜垫等都得干。忙到晚上,才轮流在厨房角落里吃些酒席上撤下的残羹剩饭,喝杯冷酒……昔年,家长带我去过几次红白喜事,长班给我的印象是蔼然可亲,非常勤快。办喜事时,一支烟工夫能将花堂布置得花团锦簇,桌头、椅披都是红缎绣花,一派喜气洋洋……可长辈们却蔑视他们,也不仅是身份卑微,我曾听一位老者说,他们狡黠、势利,看人下菜碟,见钱眼开等,这是不是“一篙打翻一船人”呢?我怀疑。

记得清人笔记里有一则故事,可发一噱:历来不少行业有“祖师爷”,如木匠祭鲁班,梨园界祭唐明皇等。京师某会馆中住一士子,他发现长班每年的某日也奉祀祖师爷,唯祭拜时关门闭户,不让外人见。士子好奇,终探窥出秘密,原来牌位上竟写着“中山狼之神位”,可算把长班骂苦了。